

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0.02.005

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李荣林 冯 凯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 要: 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增加, 对援助增长有效性的评价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目前缺乏对该问题的系统阐述。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当前可归纳为“有效论”、“条件有效论”与“无效论”三类, 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为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支出以及国内消费四个方面。未来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应当重视援助资金异质性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应加强援助增长效应不同机制的对比研究, 此外还应当拓展数据获取范围并注意数据处理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关键词: 对外援助; 经济增长效应; 援助增长机制

中图分类号: F114.4/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072(2020)02-0051-14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一直致力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对外援助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 特别是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后, 中国对外援助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联系更加紧密。^①如何通过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提高援助的有效性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援助的有效性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各自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从国际研究来看,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 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 援助是否可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援助规模、援助类型、受援国的收入水平和国内政策等客观条件; 而少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影响不显著, 甚至会阻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国内学者主要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部分研究结果表明, 在过去的40年中,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走上国际发展援助的舞台, 并从受援国逐步转变为对外援助国。^②中国的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推动了其经济结构变化, 改善了社会福利并降低了贫困。^③但也有西方学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缺乏透明度, 增加了受援国的债务负担, 不利于其经济长期增长。^④

^{*} 基金项目: 本文受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背景下的中非产能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9ZDA063)的资助。冯凯为本文通信作者。

① 孙伟,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的对外援助与开发合作[J]. 宏观经济管理, 2017(6):5-9.

② N.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84(6): 1205-1221.

③ C. Arndt, S. Jones, and F. Tarp, “Assessing Foreign Aid’s Long-Run Contribution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2015, 69: 6-18.

④ J. Onjala, “China’s Development Loans and the Threat of Debt Crisis in Keny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8, 36: 710-728.

因此无论从国际发展援助还是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看,都需要对援助的增长效应与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在梳理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援助是否促进了受援国经济增长,进而考察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阐述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对外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对外援助资金已经成为这些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种外部资源。^①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不断开展,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受援国来说,经济增长始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评价援助是否有效,应首要关注其是否促进了受援国经济增长。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多集中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关于该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 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即“有效论”。最初援助并没有与其他类型的资本分开,因此早期研究一方面是要界定对外援助资金的金额,另一方面是评估其相关关系。Papanek首次对51个国家在1950~1965年间三个五年阶段的数据进行回归,首次证实援助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并不是严格的因果关系,且存在很大的内生性问题,即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会影响援助国对援助资金的分配。但对于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援助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依然是存在的。^②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一方面需要扩展研究样本,考查援助与增长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更精确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断。

在样本拓展方面,Dowling和Hiemenz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地区,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证实援助对受援国GDP增长存在正向影响。类似的结果也在Asteriou的研究中得以体现。^③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援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援助产生了线性的增长效应。Mallik以最贫穷和高度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为研究样本,通过协整分析发现人均实际GDP与援助占GDP的百分比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Orji等人通过分析尼日利亚接受的外国援助后也发现,援助促进了尼日利亚的资本积累,推动了其国内经济发展。^④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在援助总量层面考

① 席艳乐,曹亮,陈勇兵.对外援助有效性问题研究评述[J].经济动态,2010(2):125-130.

② G. F. Papanek, "The Effect of Aid and Other Resource Transfers on Savings and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2, 82: 934-950; P. Mosley, "Aid, Savings and Growth Revisite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0, 42(2): 79-95.

③ J. M. Dowling Jr, and U. Hiemenz, "Aid, Savings, and Growth in the Asian Regio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3, 21(1): 3-13; D. Asteriou,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pproach for Five South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9, 31(1): 155-161.

④ Z. Askarov and H. Doucouliagos, "Development Aid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015, 66: 383-399; G. Mallik,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Six Poorest African Countries",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8, 38(2); A. Orji, J. E. Ogbuabor, and O. I. Anthony-Orji, et al, "Analysis of Capital Formation and Foreign Aid Nexus 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2019, 14(2): 266-280.

查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考量援助时间长短对增长的影响。所以,Clemens 等人按照援助产生效果的时间长短,将援助分为现期援助(紧急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短期援助(可能会在四年内刺激增长的援助)与长期援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增长的援助)。研究发现现有短期援助占总援助的比例超过一半,且这种短期援助与四年间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因果关系,短期援助每增加1美元,可以使受援国GDP现值增加1.64美元。Sothan研究了1980年至2014年间柬埔寨的援助问题,同样证实外国援助在短期内对柬埔寨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①援助时间的长短也体现出援助资金融资方式的差异,短期援助多为赠款形式,长期援助多为贷款形式,贷款援助会加重受援国长期债务负担,而赠款却不必在未来偿还,不会对受援国的财政产生影响,因此短期援助的效果更好。^②Moreira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时滞,同时也指出援助的微观效果是显而易见的。^③Chauvet和Ehrhart还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以接受外国援助的29个发展中国家(其中11个在非洲)中435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后发现,接受外国援助对于本国企业的销售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援助缓解了受援国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可以提升其业绩表现。^④

在研究方法方面,很多文献倾向于采用协整分析来估计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比如Irandoost和Ericsson基于面板协整理论,以1965~2000年期间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外国援助可以促进国内储蓄与经济增长。^⑤但考虑到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因此还需要引入适当的工具变量以解决该问题。Galiani等人发现,自1987年以来,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援助资格部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否低于一定的阈值。在受援国超过该阈值后,援助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平均下降约59%。根据阈值构造工具变量,以1987年至2010年间低于收入门槛的35个国家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平均而言,援助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人均GDP增长率实际提升约0.35%。此外,Dreher等人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时,将中国的钢铁产量与受援国接受中国援助的概率相结合构造工具变量,在固定国家与时间效应后发现,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显著地促进了受援国经济增长。在援助项目实施两年后,每新增一个援助项目平均而言可以使受援国经济增长约0.7%。^⑥考虑到经济增长问题中可能存在动态

① M. A. Clemens, S. Radelet and R. R. Bhavnani, Counting Chickens When They Hatch: The Short Term Effect of Aid on Growth,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44, July 2004; S. Sothan,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ambodia",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8, 27(2): 168-183.

② O. Morrissey, O. Islei, D. M'Amanja, Aid Loans Versus Aid Grants: Are the Effects Different? CREDIT Discussion Paper, July 2006.

③ S. B. Moreira,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5, 30(2): 25-48.

④ L. Chauvet, and H. Ehrhart, "Aid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5: 461-477.

⑤ M. Irandoost, and J. Ericsson, "Foreign Aid, Domestic Savings, and Growth in LDCs: An Application of Likelihood-Based Panel Cointegration", *Economic Modelling*, 2005, 22(4): 616-627.

⑥ S. Galiani, S. Knack, and L. C. Xu, et al, "The Effect of Aid on Growth: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7, 22(1): 1-33; A. Dreher, A. Fuchs, and B. Parks,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AidData Working Paper, No.46, October 2017.

效应,即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可能会影响当期经济增长,因此朱玮玮等人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援助非洲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显著地促进了该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①

(二) 对外援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条件有效论”。这种条件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条件,一般通过援助与GDP的比值来反映这种内部条件,援助金额本身应该有一个最优范围,适度援助可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而过多援助则适得其反。这种关系正如同大部分药物的使用规则,因此被称为药物模型(Medicine Model)。另一方面是外部条件,即援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受援国自身的状况,尤其是其国内是否有完善的政策与制度,因此被称为良政模型(Good Policy Model)。^②

关于药物模型, Ali和Isse发现,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性关系即援助存在门槛效应,超过该门槛,更多的援助将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倒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随着援助占GDP的比例不断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由正转负。^③药物模型也反映出受援国本身对于援助资金的吸收能力并不是无限的。Collier指出,如果通过传统方式将援助增加一倍,并不会对受援国经济增长带来同比例的增加,因此援助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这种递减现象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更为明显。Feeny和McGillivray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虽然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援助,但从纯粹基于人均收入增长的角度来看,许多国家所获得的援助却远远超过其能够有效吸收的数量。而超过一定合理水平的援助涌入受援国的话,也不利于甚至阻碍受援国经济增长。^④上述研究虽然能够确定对外援助存在门槛效应,但却很难给定具体的阈值。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受援国之间异质性较强,因此通过门槛回归分析很难得到一个平均阈值。而Harb和Hall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了1984~2008年间25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传统面板门限回归需要将数据根据门槛变量分组,组与组之间的边界是不连续的,这并不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情况。而PSTR可以放松这一限制,该方法识别每个时间点的估计系数,并内生地确定适当的阈值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对于发展水平处于中下等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来说,援助占GDP比例的阈值分别为4.3%和11.38%;对于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的国家,援助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边际递减,但无法找到精确的阈值。^⑤这表明集体估计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援助的阈值水平是一种误导。

① 朱玮玮,徐康宁,王美昌,中国援助是否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18(7):108-120.

② P. S. Jensen, and M. Paldam, “Can the Two New Aid-Growth Models be Replicated?”, *Public Choice*, 2006, 127(1-2): 147-175.

③ A. M. Ali, and H. S. Is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Aid on Growth”,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2005, 11(1): 1-11.

④ P. Collier, “Is Aid Oil? An Analysis of Whether Africa can Absorb More Aid”, *World Development*, 2006, 34(9): 1482-1497; S. Feeny, and M. McGillivray, “Aid Allocation to Fragile States: Absorptive Capacity Constrai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 2009, 21(5): 618-632; R. Lensink, and H. White, “Are There Negative Returns to Ai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37(6): 42-65.

⑤ N. Harb, and S. G. Hall, “Does Foreign Aid Play a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Linear Analysi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9, 73: 192-204.

关于良政模型, Burnside和Dollar最先指出援助对拥有良好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在政策不佳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影响。^①好的政策是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如果援助分配以受援国实施良政为条件的话,那么援助将更加有效。良政对于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在受援国社会和政府成功实施促进增长政策的地方,援助资金也会提供更多有益的支持。良好政策和外国援助的结合为受援国私人投资和增长创造了环境。^②而治理不善的政府,援助资金反而扩大了其可用资源,减少其需要向公民解释其行动的必要,使受援国政府产生寻租行为,这可能会降低受援国政府实行良政的动力。这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治削弱,产权保护措施缺位,导致商业环境破坏,从而降低受援国经济增长。^③此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腐败问题,援助可能会加剧其腐败,从而降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④这种观点在传统援助国中得到普遍认可,其援助实践中多会要求受援国政府采取民主制度,进行政治改革。但学术界仍有很多不同看法; Hansen和Tarp重新回顾了援助与增长的文献,评估了关于良政影响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发现,发现即使在政策环境不利的国家中,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牢固的联系。^⑤进一步, Dalgaard和Hansen采用修正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援助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尽管良政会刺激增长,但它们可能同时降低外国援助的效力。这表明Burnside和Dollar的研究结论可能与数据密切相关,其结果并不稳健。Easterly等人进一步搜集了更多年份的数据,将Burnside和Dollar的数据向后更新4年至1997年,并填补了1970~1993年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回归后发现,良政并没有显著地影响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⑥如何定义良政可能是解决分歧的一种尝试。如果将良政限制为自由市场政策时,良政确实会刺激受援国经济增长,但似乎不会影响援助的有效性。如果将良政定义为产权保护与法治时,其对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⑦因此,不同类型的良政可能对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一致。这也提示我们宏观经济变量与良政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增强该假设的理论和经验相关性。

Jensen和Paldam为两种有效条件的争论做了总结,通过对比药物模型和良政模型后发现,样本内良政模型的结果是脆弱的,而药物模型的结果更加稳健。但不应该否认民主制度对于受援国政府的监督作用,如果援助资金缺乏这种监督,可能会被用于

① C. Burnside, and D. Dollar,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4): 847-868.

② D. Dollar, and W. Easterly, "The Search for the Key: Aid, Investment and Polic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999, 8(4): 546-577.

③ S. Djankov, J. G. Montalvo, and M. Reynal-Querol, "The Curse of Aid",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8, 13(3): 169-194; R. Rajan, and A. Subramanian, "Does Aid Affect Govern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2): 322-327.

④ P. Mauro, "Corruption and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 681-712.

⑤ H. Hansen, and F. Tarp, "Aid Effectiveness Dispu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12(3): 375-398.

⑥ C. J. Dalgaard, and H. Hansen, "On Aid, Growth and Good Polic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37(6): 17-41; W. Easterly, R. Levine, and D. Roodman, New Data, New Doubts: A Comment on Burnside and Dollar's, NBER Working Paper, No.w9846, July 2003.

⑦ J. Hudson, and P. Mosley,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1, 13(7): 1023-1038; S. Knack, and P. Keef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Economics & Politics*, 1995, 7(3): 207-227.

满足政府自身的非生产性目标，而不会满足受援国居民减贫的需求。^①对于良政模型来说，如果将援助与鼓励民主化的努力相结合，援助将更加有效。但也应该认识到，援助不应该试图成为受援国全社会转型的催化剂，因此在援助实践中，援助机构应该设定更加温和的目标，更加具体地关注需要帮助的群体。^②

（三）对外援助不能显著地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显著，即“无效论”。Doucouliagos和Paldam整体上分析了大量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文献，对其中68篇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进行可比估计，发现对外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结果的确具有正平均值，但是数值太小，微不足道且存在下降的趋势。^③造成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数据处理与工具变量的选取问题。比如Nowak-Lehmann等人采用年度数据和五年平均数据，发现对于高度依赖援助的国家来说，援助通常对人均收入有微不足道或微小的负面影响。Dreher和Langlotz以1974年至2009年间96个受援国为样本，采用援助国援助分散化与受援国接受援助的概率的乘积为工具变量，并根据经济政策、民主水平与冷战时期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所有这些子样本都不支持援助对增长有显著影响的结论。^④其次是样本的选择单一，得到的结论不具有代表性。比如Leshoro认为，南非既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外国援助资金最青睐的地区之一。因此南非是研究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关系及其效果的良好案例。但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负向的。^⑤

（四）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评述

目前关于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大体上可以归为以上“有效论”、“条件有效论”和“无效论”三类，且三种结论都在实证层面得到了检验。总结起来，虽然各项研究的视角不同，但以下因素对研究结论会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援助资金的形式问题，Bjørnskov指出大多数研究将援助流量视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没有区分援助资金的来源、流向以及具体的融资形式，其结果可能导致援助不会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或发展的结论。^⑥尤其是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其主要资金形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而是以优惠贷款形式为主的其他官方财务（OOF）。^⑦这类援助主要是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及

① J. Svensson, “Aid, Growth and Democracy”, *Economics & Politics*, 1999, 11(3): 275–297; P. Collier, and D. Dollar, “Aid Allo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6(8): 1475–1500.

② S. Kosack, “Effective Aid: How Democracy Allows Development Ai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1): 1–22; W. Easterly, “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3, 17(3): 23–48.

③ H. Doucouliagos, and M. Paldam, “Aid Effectiveness on Growth: A Meta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24(1): 1–24.

④ F. Nowak-Lehmann, A. Dreher, and D. Herzer, et al,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Raise Per Capita Income? A Time Series Perspec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e*, 2012, 45(1): 288–313; A. Dreher, and S. Langlotz, Aid and Growth. New Evidence Using an Excludable Instrument, CESifo Working Paper, No.5515, September 2017.

⑤ T. Leshoro,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Africa: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Bounds Testing”,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ciences*, 2013, 6(1): 55–66.

⑥ C. Bjørnskov, *Lessons on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⑦ A. Dreher, A. Fuchs, and B. Parks, et al,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8, 62(1): 182–194.

承包受援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服务的,^①因此与西方国家的援助存在很大的差异。Minoiu和Reddy将非发展援助从发展援助中区分出来后发现,发展援助是可以促进受援国经济长期增长的。^②Bandyopadhyay等人的研究就明确地将援助资金分解为赠款和优惠贷款两种形式,发现前者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且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③因此援助资金的不同形式对受援国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影响,如果仅仅考虑援助总量,得到的结果是不稳健的。

关于援助国目的问题,通常认为人道主义、商业、政治和战略动机是推动援助分配过程的主要因素。这与主要援助国的公开表态一致,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关切,以促进受援国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的发展和减贫需求为首要目标,与此同时也要考虑援助国自身的商业利益和政治战略等。^④但是不同的利益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受援国经济增长需求并没有被优先考虑,从而造成援助无效。

关于受援国异质性的问题,虽然接受援助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但国与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这使得一方面很难得到适用于所有受援国的结论,另一方面只对个别国家的研究又不具备代表性。因此在研究中应该选取相似度较高的受援国组成样本,并充分考虑受援国经济状况是否会影响援助的问题。

关于直接促进与间接促进问题,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解答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问题,而后发现援助的有效性存在一个门槛,超过阈值的援助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而良政作为援助的有效条件被提出后,随之而来的学术争议很大。可以看出的是,不同研究关于良政的定义存在差异。能够促进受援国政治稳定的良政可以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进而影响政府施政,使得诸如外国援助之类的公共资源被充分利用。^⑤而援助国在考虑援助资金分配时,也会倾向于考虑受援国是否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采取J产权保护措施,实施良政的国家本身也会受到更多的援助。^⑥

综上所述,对外援助是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首先表现为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其次是援助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报酬递减,随着援助量的上升,最终援助会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这表明受援国对援助的有效吸收是有限度的。受援国的良政如果能够促进其政治稳定,形成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与民主化的监督机制,这对吸引援助资金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援助除了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变量外,还更应该关注微观个体的需求,受援国经济增长也不仅仅反映在人均GDP的增长上,更应该关注的是其改善本国居民生活质量的

① 黄梅波.中国国际援助与开发合作的体系构建及互动协调[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4):14-26.

② C. Minoiu, and S. G. Reddy, "Development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A Positive Long-Run Relation",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0, 50(1): 27-39.

③ S. Bandyopadhyay, S. Lahiri, and J. Younas, "Financing Growth Through Foreign Aid and Private Foreign Loans: Nonlineariti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5, 56: 75-96.

④ A. Isopi, and G. Mavrotas, *Aid Allocation and Aid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14-157.

⑤ N. Dutta, D. Mukherjee, and S. Roy,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Foreign Aid: Does Political Stability Matt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5, 29(3): 259-286.

⑥ A. Alesina, and D. Dollar,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5(1): 33-63

能力。但也应该注意到,受援国过分依赖援助是难以实现长期增长并摆脱贫困的。援助不是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在短期内给予受援国经济强有力的支持,在长期内可帮助其培养国内经济增长动力,这才是对外援助最本质的目的。

二、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虽然大部分文献证实了援助对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关于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主要是因为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果链条比较复杂,且存在噪音,这些都会影响因果识别的准确性。^①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即援助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根据现有研究,主要可以从援助与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资本积累以及公共支出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援助、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一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既可实现国内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又可获得外汇资金,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援助可以促进受援国的进出口贸易,就一定会对其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通过促进受援国贸易额、增强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感、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的“促贸援助”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对欠发达国家实施援助的重要手段。

首先,对外援助可以降低受援国贸易成本,这可以显著地增加双边贸易,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Pettersson和Johansson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了1990~2005年间184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后发现,援助改善了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双边出口贸易,这主要是因为援助可以有效地降低双方的距离成本。^②黄梅波和朱丹丹通过对63个受援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促贸援助”可以有效地降低受援国进出口成本,这种成本削减效应对于低收入的受援国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受援国出口是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不通过该渠道发挥作用的援助反而会阻碍受援国经济增长。^③对于援助国来说,对外援助也可以增进其与受援国的关系,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Lemi发现经合组织成员国对非援助增加了非洲与经合组织国家的进出口贸易。Liu和Tang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对非援助对捐助国与受援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影响,也发现援助显著促进了中国和美国对非洲出口贸易的增加。^④

其次,受援国在接受援助后可使其出口多样化水平显著提高,这有助于受援国摆

① F. Bourguignon, and M. Sundberg, “Aid Effectiveness—Opening the Black Bo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2): 316–321.

② J. Pettersson, and L. Johansson, “Aid, Aid for Trade, and Bilateral Trade: An Empirical Stud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3, 22(6): 866–894.

③ 黄梅波,朱丹丹.“促贸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基于63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38–148;朱丹丹,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吗?——兼论“促贸援助”方式的有效性[J].中国经济问题,2018(2):24–33.

④ A. Lemi, “Aid for Trade and Africa's Trad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Bilateral Trade Flows with China and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African Trade*, 2017, 4(1–2): 37–60; A. Liu, and B. Tang, “US and China Aid to Africa: Impact on the Donor–Recipient Trade Rela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48: 46–65.

脱出口产品单一而出现“荷兰病”的现象。Munemo指出,援助对于受援国出口多样化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如果外国援助不超过受援国GDP的20%,会极大地促进出口多样化;而超过20%后,则会显著阻碍出口多样化。大多数受援国接受的援助占GDP的比例低于2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使用援助资金增强出口多样化水平,避免“荷兰病”造成的影响。^①黄梅波和朱丹丹的研究也发现,“促贸援助”可以显著提高受援国出口多样化水平,而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多样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促贸援助”在合理水平内是可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②

再次,援助也能够改善受援国经济基础设施状况,提升受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提振受援国贸易总额,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Cali和Velde的研究证实,促进受援国贸易便利化的援助降低了其交易成本,提升了受援国的出口能力。这主要是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援助实现的。^③顾振华和高翔计算了2013年53个非洲国家对华贸易的限制程度,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的增加会显著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指数,这种削减效应在农业部门更加明显。^④

最后,也有学者提出,援助资金可能会造成受援国实际汇率高估,进而削弱其出口竞争力。Elbadawi发现,对很多受援国来说,不可持续的官方发展援助已造成相当大的部分国家实际汇率高估,这对特别依赖援助的国家来说更为明显。汇率高估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出口价格冲击,从而削弱受援国的出口,降低其经济增长潜力。^⑤但这种担心可能是过虑的,虽然援助造成的汇率升值可能对受援国的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援助在克服贸易瓶颈和促进双边贸易关系方面可能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⑥而且援助促进贸易本身也存在一个最优阈值,只要不超过这个阈值,援助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受援国扩大出口的。不利的价格冲击并非援助带来的,相反可以通过抵补援助的增加来减轻负面冲击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二) 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短缺或资本不足是制约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外援助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受援国的可用资本,而且可以通过降低投资风险间接地促进FDI,从而弥补受援国的资金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补充其必要的资本,促进FDI流入,进而带动其经济增长。援助资金既可以帮助受援国补充有形的物质资本,也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积累。Gyimah-Brempong和Racine研究证实了外部援助对有形资本投资具有积极而重大的

① J. Munemo, “Foreign Aid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1, 20(3): 339–355.

② 黄梅波, 朱丹丹. 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6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15(2): 97–108.

③ M. Cali, and D. W. Te Velde, “Does Aid for Trade Really Improve Trade Performance?”,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5): 725–740.

④ 顾振华, 高翔.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 基于53个非洲国家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8): 73–87+135–136.

⑤ I. A. Elbadawi, “External Aid: Help or Hindrance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999, 8(4): 578–616; P. Collier, P. Collier, and J. Dehn, *Aid, Shocks, and Growth*, The World Bank, 2001.

⑥ F. Nowak–Lehmann, I. Mart í nez–Zarzoso, and D. Herzer, et al, “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Recipient Exports to Donor Countri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3, 149(3): 505–535.

影响,对于政策环境良好的国家而言,FDI流入会更多。^①Bhavan等进一步将援助分解为物质资本援助、人力资本援助以及基础设施资本援助,发现三类资本都是FDI的重要补充,在南亚国家,援助促进了FDI的流入,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此外,援助还可以提高受援国的资本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缓解其受到的资金预算约束。^②

第二,对外援助加强援助国对受援国的了解,降低了投资风险,增加了FDI流入,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Zak和Knack的研究表明国别风险会造成低信任度,从而降低投资效率,不利于开展跨国投资。^③这种不信任的环境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Asiedu等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征收风险极大地阻碍了FDI流入,而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可以减轻征收风险对援助国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Jin和Zeng证实对外援助也是出于保护援助国直接投资免于被没收的愿望。Efobi等人还发现,对外援助可以有效地减少当地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对FDI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腐败控制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④

第三,对外援助对FDI的促进作用应是非线性的。这一方面表现为援助对FDI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援助对FDI的影响在长短期内并不相同。董艳等考查了中国对非援助与对非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先升后降,而针对生产部门与政府部门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则先降后升。^⑤Kimura和Todo指出,援助对FDI有“先锋效应”,即援助国的对外援助可以促进本国的FDI,援助要早于FDI产生影响。^⑥王翬等分析了17个OECD国家的对华援助与FDI的数据,发现短期内援助会挤出FDI,但中期的援助促进了这些国家对华投资,且时间越长,这种促进效应就越强。张汉林等也证实援助与FDI之间的关系会随时间而变化。总体而言,援助与投资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⑦二者配合可以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担心援助资金的增加会挤出FDI,从而不利于受援国经济增长。例如Herzer和Grimm研究了援助与私人投资之间的长期关系后发现,援助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为负,援助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反过来,较高的私人投资会导致较低的援助流入。但是这种结果可能并没有考虑援助与FDI之间存在的时滞效应,而且

① K. Gyimah-Brempong, and J. S. Racine, “Aid and Investment in LDCs: A Robust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0, 19(2): 319–349.

② T. Bhavan, C. Xu, and C. Zho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id and FDI in South Asian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1, 3(2): 143–149; A. Kumar, “Foreign Aid, Incentives and Efficiency: Can Foreign Aid Lead to the Efficient Level of Invest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 21(3): 678–697.

③ P. J. Zak, and S. Knack,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0): 295–321.

④ E. Asiedu, Y. Jin, and B. Nandwa, “Does Foreign Aid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Expropriation Risk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78(2): 268–275; Y. Jin, and Z. Zeng, “Expropri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Positive Economic Theory of Foreign Aid”, *Economic Theory*, 2017, 64(1): 139–160; U. Efobi, S. Asongu, and I. Beecroft, “Aid, Terrorism,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Insight Conditioned on Corruption Contro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018, 32(4): 610–630.

⑤ 董艳,樊此君.援助会促进投资吗——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3):59–69.

⑥ H. Kimura, and Y. Todo,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4): 482–497.

⑦ 王翬,甘小军,刘超.国际双边发展援助对FDI的影响研究——基于17个OECD国家对华发展援助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3(6):115–123;张汉林,袁佳,孔洋.中国对非洲ODA与FDI关联度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0(11):69–74+89.

两者没有考虑到援助与FDI之间的互补性。比如Arazmuradov测试了1993~2008年间中亚国家接受的援助与FDI之间的关联度,发现虽然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总体而言,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并且援助的增加还抵消了国内资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①总的来说,援助与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对外援助确实通过吸引FDI的流入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②

(三) 援助、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

按照资金分配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援助分为转移支付类援助和非转移支付类援助,后者又可进一步分为公共支出类援助和产业援助两种。转移支付类援助直接流向个人,而公共支出类援助主要是促进受援国政府支出的增加。Chao等的研究指出,公共支出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增加对公共投入的援助分配可以促进增长,从而增加经济福利。Kalaitzidakis 和Kalyvitis建立了一个援助形成公共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援助国对于公共资本的共同资助可以促进较贫穷的欧盟国家实现经济增长。^③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很高。一方面公共支出可以促进受援国政府对本国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积累人力资本,进而带动经济增长。Fashina等研究了对尼日利亚的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尼日利亚的增长对人力资本冲击敏感,而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加上额外的援助流入可以促进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Asongu和Tchamyou分别考查了援助对受援国不同阶段教育的影响,发现来自DAC的援助对小学入学率和终身学习有积极影响,而多边援助对终身学习有积极影响。Lu等人发现,外国援助可以促使受援国政府增加农村医疗设施的投资,从而提升这些国家农村居民的福利。^④另一方面公共支出的扩大也会带动本国生产能力的提升,进而带动经济增长。Selaya和Sunesen也发现,当援助用来筹集补充公共资本与人力资本时会带动受援国边际生产率提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⑤此外,援助与公共支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Marć的研究指出,当受援国政府减少国内收入或减少净借款时,援助对政府支出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从长期看,援助是部分可替代的,而从短期看,援助是高度可替代的。^⑥

① D. Herzer, and M. Grimm,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Priv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Cointegration",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4(20): 2537-2550; A. Arazmuradov, "Can Development Aid Help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Economic Affairs*, 2015, 35(1): 123-136.

② N. Hidayat, A. Ullah, and G. Ghazala, "The Nexus Between Foreign Aid and FDI Inflows: Evidence From Selected South Asian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17, 14(1): 75-79.

③ C. C. Chao, S. W. Hu, and C. C. Lai, et al, "Foreign Aid,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Environ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16(1): 62-71; P. Kalaitzidakis, and S. Kalyvitis, "On the Growth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Aid for Public Investment Co-Financing",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12(2): 354-371.

④ O. A. Fashina, A. J. Asaley, and J. O. Ogunjobi, et al, "Foreign Aid,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Niger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11(2): 104-117; S. A. Asongu, and V. S. Tchamyou, "Foreign Aid,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Africa",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9, 10(1): 126-146; C. Lu, B. Cook, and C. Desmond, "Does Foreign Aid Crowd Out Government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Rural Health Centres in Rwanda", *BMJ Global Health*, 2017, 2(3): e000364.

⑤ P. Selaya, and E. R. Sunesen,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2012, 40(11): 2155-2176.

⑥ L. Marć, "The Impact of Aid on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New Evidence on Fungibilit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 21(3): 627-663.

(四) 援助、国内消费与经济增长

对于转移支付类援助来说,一方面,援助资金使受援国居民直接获得一笔可支配收入,这可以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并提升其福利水平。Arellano等证实,援助的确为受援国的消费提供了资金,提升了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促进了消费的增加。^① Dalgaard等发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很低的国家,增加消费的边际效用很大,援助能通过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Gomanee等也发现,对外援助的确与受援国的福利水平增加有关,这在低收入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这种增加是直接通过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带来的。^②另一方面,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会使受援国私人储蓄增加,为长期经济增长积累可用资本。Afawubo和Mathey指出,对外援助确实与受援国储蓄成正比,但援助可能存在的波动性不利于储蓄的长期积累,因此需要受援国政府建立更高质量机构,减缓这种波动性的不利影响。^③但是,转移支付类援助虽然增加了个人财富,也相应地增加了闲暇时间,降低了个人提升人力资本的激励。因此,外国援助可能并不总是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和福利增加。^④因此对于受援国来说,适当推迟当前期消费可能会实现更长远的增长目标。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大体上分为国际贸易、FDI、公共支出以及消费等四种。首先从国际参与的角度看,国际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是受援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两种重要方式。一方面,经济增长与贸易、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⑤另一方面,对外援助又可以显著地促进受援国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因此贸易和投资是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中介变量。在这种机制下,援助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会使受援国的经济增长0.25%。^⑥其次从受援国内部来看,援助既可以增加受援国政府的公共支出,提升本国社会基础设施水平与人力资本积累,也可以直接增加受援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带动消费与储蓄的增加,进而带动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三、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展望

对于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

① C. Arellano, A. Bulif, and T. Lane, et al, "The Dynamic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Aid and Its Variabi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1): 87-102; M. Lof, T. J. Mekasha, and F. Tarp, "Aid and Income: Another Time-Series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2015, 69: 19-30; J. Temple, and N. Van de Sijpe, "Foreign Aid and Domestic Absor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8: 431-443.

② C. J. Dalgaard, H. Hansen, F. Tarp, "On the Empirics of Foreign Aid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4(496): F191-F216; K. Gomanee, O. Morrissey, and P. Mosley, et al, "Ai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Aggregate Welfare",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3): 355-370.

③ K. Afawubo, and S. Mathey,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on Savings and Inve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Do Volatility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Matter?", *Applied Economics*, 2017, 49(51): 5212-5230.

④ X. Liu, X. Zhang, and C. C. Chao, "Foreign Aid, Leisure-Effort Choice,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Modelling*, 2014, 43: 435-438.

⑤ R. Levine, and D. Renelt,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4): 942-963.

⑥ K. Gomanee, S. Girma, and O. Morrissey, "Aid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Accounting for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 17(8): 1055-1075.

果。伴随着国际援助体系的不断成熟以及援助实践的不断发展,对于援助有效性的研究与评价仍然是政策制定者与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本文认为未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应当向更加细致化和微观化方向发展,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重视援助资金异质性分析。援助资金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的跨国流动,但对于不同的援助国与受援国来说,援助资金既存在规模异质性,又存在目的异质性。如果仅在总量层面上对援助进行研究,很难揭示不同种类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现有研究多从援助资金的流向角度进行分类,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可以明确不同目的的援助资金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但前提是这种资金多为国际发展援助(ODA)。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来说,ODA并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如果一概而论,结果难免出现偏误。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考查不同来源的援助资金会对受援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2. 关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往的研究多直接假定援助的分配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受援国的发展需求,以及援助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这种做法一是要保证援助国拥有与受援国一样多的信息,二是要保证受援国政府不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事实上,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援助国政府不能有更多渠道获得信息或改变受援国政府行为的话,那么按照效率原则分配的援助仅仅是一个基准指南,并不会带来实际效果。^①此外,援助可能会改变受援国政府的策略,如果援助主要分配给最需要的穷人,那么受援国政府会在减贫方面投入更少的精力,这反而降低了受援国穷人的福利。^②因此有必要将双方的行为纳入博弈进行分析。

3. 加强援助影响经济增长不同机制的对比分析。对于援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现有文献已经有了较好的研究,但多数文章仅关注了一种影响机制,没有对不同的影响机制进行对比研究。不同机制的对比有助于确定援助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这既可以为援助国开展有效援助提供有益借鉴,也可以为受援国经济增长提供参考。

4. 利用援助国区域数据拓展研究范围。对于大部分受援国来说,其宏观统计数据并不全面,且存在严重的失真问题,使得实证结果出现很大的偏误。而国内区域层面的数据更是难以获得,这使得大部分关于援助的实证研究仍然停留在国别面板阶段。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拓展数据来源。Henderson 等人的研究表明,夜间灯光数据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且实证分析不必再以国家为单位,可以衡量次国家地区与超国家地区的增长。^③将援助项目的地理坐标与夜间灯光数据相结合,可以进一步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经济的影响。比如 Bluhm 等人利用上述数据和方法,发现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援助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溢出效应,有效地降低了受援国区

① P. Collier, and D. Dollar,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What have We Learnt?",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4(496): 244-271.

② J. Svensson, "When is Foreign Aid Policy Credible? Aid Dependence and Condition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61(1): 61-84.

③ J. V. Henderson, A. Storeygard, and D. N. Weil,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2): 994-1028.

域不平等；^①Civelli 等人以乌干达为例，利用空间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援助冲击对夜间灯光亮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②Graff 也利用灯光数据研究了空间不平等问题，并模拟了非洲大陆上的道路，发现如果能更好地组织其国家道路系统，非洲的总福利将增加 1.1%。^③因此将夜间灯光数据引入对外援助问题的相关研究，既可以验证非洲国家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又可以拓展研究范围。

5. 注意援助数据处理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现有研究对于援助数据的处理多将其转换为占 GDP 的比例，以此来进行标准化。如果没有明确的假设支持，这种做法并不一定合理，可能会使得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出现向下偏误。Annen 和 Kosempel 为此做了一个对比分析，发现在使用总援助时援助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显著且稳定的关系，而在使用援助占 GDP 比例时却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变为负向不显著。^④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于数据的处理应以明确的研究思路为基础，否则得到的结论可能存在偏差。

【作者简介】李荣林：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南南合作。

冯 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南南合作与国际发展援助。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Foreign Aid

LI Rong-lin & FENG K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on growth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issue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pects and obtained a lot of results, but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is issue. Through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releva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first classifies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foreign ai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nd finds that foreign aid can indeed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recipient countries. Secondly, this paper further sorted out the mechanism of how aid affec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summarized it into four routes: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ublic expenditure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aid fund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countries, compare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aid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expand the range of available data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data processing on empirical results.

Keywords: foreign aid; economic growth effect; aid growth mechanism

(责任编辑：马莹)

① R. Bluhm, A. Dreher, and A. Fuchs, et al, Connective Financing: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Diffus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idData Working Paper, No.64, September 2018.

② A. Civelli, A. Horowitz, and A. Teixeira, "Foreign Aid and Growth: A Sp P-VAR Analysis Using Satellite Sub-National Data for Ugand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4: 50-67.

③ T. Graff, Spatial Inefficiencies in Africa's Trade Netw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5951, June 2019.

④ K. Annen, and S. Kosempel, Why Aid-to-GDP Ratios?, University of Guelp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1801, January 2018.